

◇刘鹏凯专栏·西北以北

大姑馇记

早先大姑馇有一个站点，坐9路车沿情侣路在海边拐几个弯，就经过了大姑馇。远远望过去，大姑馇是一片高高矮矮、胖瘦不一的房子。大姑馇似乎一直就那么无忧无虑地在海边待着，像一个刚刚冲完凉的年轻寡妇，脸上洋溢着春光，心里藏着一点点暖昧的念想。然后，这点念想随着穿衣的速度被一层一层剥去了，直到丰乳肥臀被完全遮蔽，湿润的青丝被完全风干，那丝温暖的欲望最后却变成了淡淡的哀伤。

时至今日，那副美丽的哀伤总是让我念念不忘，难以割舍。

我刚来珠海的时候，怎么认也不认识那个“馇”字，查字典居然也没这个字。我妈说：“识字不识字，先识半个字。”因为上面架了个“母”字，我便将它读作了“mu”。有天跟一个朋友吃饭，不知怎么我说起了“大姑母”，那朋友笑说：“什么大姑母，还大姨父呢！”后来我才知道那个字读作“na”。从此以后，只要有人谈起大姑馇，我就一个劲儿地说：“大姑母，你说的是那个寡妇一样的大姑母吗？”直到把那人恶心得爬不起床来才善罢甘休。

记忆中，大姑馇我去过一次，那时候我常和来自烟台的朋友李学锋去吉大的乖乖的酒吧，几乎天天晚上泡在那里，主要原因是我们和那个被人叫作老板的苏醒是哥们，其实苏醒不是老板，真正的老板大都藏在后头。苏醒来自北京，是个挺有个性的女歌手，由于她只唱摇滚，加上又不爱受悠悠，别的歌手一晚上连说带唱能跑好几个场，干巴巴的苏醒每天晚上骑辆破单车气喘吁吁地跑来跑去，不知道的人以为她跑七八个场呢，其实她最多跑两个。过了两年，苏醒不做歌手了，突然改做了乖乖的酒吧老板。

在那里，我认识了老马。老马大学毕业后就从西安来了珠海，具体什么时候来的我不知道，反正比我早。他在珠海搞雕塑，就是在人家酒店门前立个碑、画个画什么的，挣点儿小钱。业余时间去酒吧唱崔健的歌，给钱也行，不给钱也行，总之他喜欢唱，唱饱了就不饿了。刚好和我相反，我是听饱了就不饿了，老李也是。那时我们怎么就那么热爱崔健呢？直到现在，我还是喜欢崔健。我一直固执地认为，看别人的演唱会给我钱了，我可以考虑去不去，只有崔健的演唱会让我掏钱我也哭着喊着去。

不知道为什么年轻的时候，我们总喜欢叫老刘老李老马的，如今我们真的老了却介意别人这么叫。老李说老马每天的花销最多两块钱，几片菜叶和几两挂面，景气的时候就抽包红塔山，我跟听天方夜谭似的，怎么也不相信，便随着老李去了大姑馇。那天傍晚，我终于在大姑馇村头的榕树下见到了传说中的夜莺，她们和大姑馇一样，一副刚刚冲完凉的样子。老马租住在大姑馇哪个位置，我不晓得，但是老马所租的房子让我大开眼界，我从来不相信大学生老马就住在那个阴暗潮湿的小的没法再小的屋子里。我在一股霉味里欣赏着老马的油画，油画的旁边挂着一把吉他，还有一封写给他远在美国的姐姐的信，那封信长达二十页，是我长这么大见过的最长的一封信。读着那封信，我突然想起了海子，想起了德令哈。顿时，我的眼睛模糊了……

那天晚上，我请老马喝酒，还有很多天南海北的兄弟，差不多一直喝到了天亮。

那年，我们年轻，不知道自己的酒量到底有多大。

后来，我们喝多了，才知道天下的酒是喝不完的。

从那以后，大姑馇彻底消失了，确切地说，整个地球上再也找不到大姑馇了。多年来，我和那个寡妇一样的大姑馇一直有一个难以忘怀的念想，我速练就问：大姑馇在哪里？大姑馇在哪里？所有人都摇摇头，然后无可奈何地笑了。

再后来，我在很多城市看到了人民路，解放街，和五一大道，唯独不见我亲爱的、深爱的、最爱的那个大姑馇。



刘鹏凯，安徽人，1968年生。著有中短篇小说集《白太阳》、散文集《心灵的边缘》《左边狐狸右边葡萄》、诗集《愤怒的蝴蝶》等。作品散见于《天津文学》《安徽文学》《山西文学》《香港文艺》《青年作家》《散文选刊》《星星》《诗歌月刊》《诗刊》等文学期刊。

◇小说世情

还 债

吴新生

母亲手术费还差三万。
强子想起昨天借钱时那些亲戚的态度，叹了一口气。

“强子，想啥呢？机器别停。”王老板叼着烟来到车间，“这个月订单多，可别耽误正事。”

强子盯着轰鸣的机器。上下，上下，每次间隔两秒。

“老板，能借点钱吗？要不预支点工资也行，我妈住院……”

“哎呀，真不巧，我刚刚在银行给供货商打了材料款。”王老板拍拍他的肩，“月底发工资，规矩你懂的，各人有各人的难处，你自己想想办法。”

强子没说话。他知道老板不是去汇款，就在刚才，他看见老板从银行背回个鼓鼓的双肩包，看见他从包里拿出一捆一捆的大钞票塞进办公室保险柜。

冲压机继续轰鸣。强子看着自己的手，指节粗大，虎口一道旧疤，是三年前一次走神留下的。

母亲下午又昏迷了，医生说不能再拖了。

强子深吸一口气。四下无人，工友都在车间另一头。他计算时间，最后一次确认冲压机的节奏。

上，下。两秒。

上。

他把左手小指伸进了工位。

疼痛来得迟。先是麻木，接着灼烧，最后才是铺天盖地的剧痛。血喷在机器上，鲜红，冒着热气。

他按下了紧急停止钮。

后来的一切像一场快进的梦。王老板煞白的脸，救护车的鸣笛，医院消毒水的气味。然后是病房里的谈判。

“你这是自己操作不当。”王老板额头上冒着汗，“工厂没责任，也算我倒霉，手术费我认了。”

强子躺在病床上，看着裹成粽子的左手，这会儿麻药开始退了，疼痛一阵阵涌上来，他强忍着道：“不行打电话给社保局，让他们评理吧！”

王老板像被掐住了脖子。他的工厂没有资质，消防不合格，所有工人连劳动合同都没签。

“私了。”王老板咬牙，“一万，最多了。”



知秋

孔祥秋

摄

◇书心书影

原上曾经有白鹿

北 雁

记忆中最为难忘的时光，应该是二十多年前的那个初夏，稠密的雨水和这个夏天没什么区别。那时的我刚走上教坛，耕耘在洱海之源牛街坝子一个叫太平的乡村小学。每天午后送走朝来夕往的老师和学生之后，孤身宿校的我便完全全地陷入了一种寂寞难耐的恐慌之中。于是，一台不知什么时候从小镇上买来的造型酷似电饭煲的收音机，就成为我每个夜晚唯一的陪伴。

也就是在那个季节，每当夜幕闭上，我都会以一种固定的姿态呆坐在面对落日的木楼之上，屏气凝神地倾听那一束来自北京的电波：“白稼轩后来引以为豪壮的是一生里娶了七房女人……”尽管我很快就在之后的某个周末，借回家探亲之机在县城的宁湖书店买来原著，并在此后短短几个日夜将之一口气读完，但我依旧不会错过那弥足珍贵的每晚三十分钟。有时干脆翻开书本，让那抑扬顿挫的男中音，伴随着眼前的文字在耳边如同水一般流过。如今想来，那种妙不可言的感觉实在是太棒了。以至十多年过去，我依旧还能绘声绘色地重复得出其中的大篇章节。

是的，这就是《白鹿原》，它散发着中国当代汉语言文学的独特魅力，它被一个刚毅坚忍的关中汉子，用锋利的齧子，在历史的天空中一行一行雕琢出来，最终被众口一词地称作当代中国最好的长篇小说之一。而这恰恰就是我四十多年的人生之中，唯一一本完整地读过四遍、并且还听过两遍以上的小说。更重要的是，我常常从内心深处生发感激，正是它，如同一个重要的人生伴侣，陪我一起度过了人生中最为孤独的岁月，并从此深深地爱上文学。

毫无疑问，《白鹿原》是绝对当之无愧的当代文学丰碑。在我的印象中，似乎从来就没有一部当代作品，能在短短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完成超过几百万册的印量发行外，还以小说、话剧、舞剧、秦腔、广播长篇评书、电影、连环画、雕塑和陶俑等不同艺术形式分别呈现。某一天闲逛书店，在万千书海中遨游，很快被累成一只快要溺水的旱鸭，最终抓住的救命稻草居然是一本精装版的《白鹿原》。翻开扉页，作家陈忠实头发花白、脸上皱纹丘

壑的近照让我顿时生发无限敬意。接连而来的感动，是彩页上并排印的，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在十多年来，先后出版发行的十种不同版本的《白鹿原》封面。翻到背面，则是作家在西安东郊灞桥老家躬身创作《白鹿原》时，每天伏案使用的木制桌椅，简单得甚至有些寒酸。相对于《白鹿原》所拥有的辉煌成就，两者的巨大反差，却更加反衬出一位当代作家的伟大人格魅力。

在听到陈忠实先生不幸于2016年4月29日凌晨因病去世的消息时，我一时心潮澎湃、惋惜万分。记得那几个月，我开始集中精力补课，在报端刊角或是借助网络，仔细搜寻有关他的一切人和事，并在网上接连下了十几个他的书，认真真真阅读他的各种散文、随笔和中短篇小说，透过那些真情涌动的文字，我不止一次地感到，陈忠实创作《白鹿原》的经历，就是他给我们这个时代留下的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并将之成为一件富于启迪的励志武器，激励着后来的一辈辈人。

在创作《白鹿原》之前，陈忠实已是誉满全国的著名作家，收揽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等多个重要奖项，担任陕西省作协副主席。但这时年过四十的他却不甘于平庸，亦不贪图于享乐，放弃舒适的城市生活，以一种艺无止境的态度面对新的挑战。为创作新著，在省作协的其他作家都纷纷搬进新建的住宅楼时，他却选择回到自己最为熟悉的农村，“一求耳根清静，二求读书弥补文学专业上的不足，三求消化所拥有的生活资源”。而更重要的是，他立志为写一本“死后可以当枕头的书”，以一种精益求精的态度面对自己的写作。难能可贵的是，作为一个绝对的实力派作家，他始终惜墨如金，字斟句酌，利用八个月的时间完成四十万字的草稿，基本立定了小说的人物、意象、结构，方始动笔。在此之前，他还查阅了大量的县志、党史和地方文史资料，同时认真学习了中国近代史，并阅读了王蒙、张炜和马尔克斯等大量的中外作家作品，甚至还创作了三四个短篇小说“试笔”。正是这种谨字谨言的态度，他用四年时间，把原本计划一百万字的文本，提炼成为不足五十万字的绝对精华。于是我们后来读到的

强子闭上眼睛：“五万。”

拉锯到最后，停在三万。现金，用报纸包着，塞在枕头底下。王老板临走前回头看他一眼，眼神复杂：“强子，你他妈真够狠。”

强子没说话，只是憋红了脸，远远目送着王老板离开了。

母亲的手术很成功。娘俩在同一家医院，强子去ICU外隔着玻璃看了一眼，监护仪上的数字平稳而规律。

几年后的一个傍晚，强子偶遇曾经的工友，两人在大排档喝酒聊天。

“我不在王老板那里干活了，他工厂去年关了。”工友说。“年审没通过，消防又不合格。”

强子感到很愧疚，想想当初自己不够爷们，确实骗了王老板。虽说后来他工厂关闭是其他原因，但总感觉不是那么回事。而而自己正是用那三万块，换回了母亲的生命。

夜市嘈杂，人声鼎沸。强子又看了眼自己的手。缺指的地方早就不痛了，只是在变天时会隐隐发痒，像有什么东西在底下悄悄生长。

其实，也没啥好后悔的，他想，一身血肉都是妈给的，还回去一点，不算什么，只是，感觉对不起王老板。他望向远处路灯下飞舞的蛾子，举起酒杯，向着昏黄的灯光虚虚一碰，然后一饮而尽。

他决定了。明天，去前面十字路口的那家小五金店，他把东西备好，他想见见王老板，把该欠的债还了，再请他喝一杯酒。



《白鹿原》 陈忠实 著
作家出版社

《白原鹿》，便成了千磨万琢、字字珠玑的文学经典。这正如著名学者范曾评价的那样：“陈忠实先生所著《白鹿原》，一代奇书也。放之东西，虽巴尔扎克、斯坦达尔，未肯轻让。”

然而让人感佩的却是陈忠实始终心平气静，不浮不躁的品格修为。他在创作随笔《白鹿原·创作经过》中说，夫人知道他已经完成创作，却又不安心地问他：“你这个写完了要是发表、出版不了咋办？”他当即回答：“如果发表不了、出版不了，我就回来养鸡。”

果然皇天不负有心人，《白鹿原》一经出版便轰动文坛，并且二十多年间始终佳评如潮，畅销不衰，以至一度洛阳纸贵。百度词条里就有这样的评价：“《白鹿原》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国长篇小说创作的重要收获之一，能够反映那一时期小说艺术所达到的最高水平。把这部作品放在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的大格局里考量，无论就其思想容量还是就其审美境界而言，都有其独特的、无可取代的地位，即使与当代世界小说创作中的那些著名作品比，《白鹿原》也应该说是独树一帜的。”

然而今天，同样是雨水如稠的夏日，一代文学巨匠已和这个时代长辞十年之久。看着书架上依然架着的那本在乡村学校陪我度过八年寂寞时光的鸿篇巨制，满腔疼痛之中，我相信它绝对不只是我一个人的精神图腾。

原上曾经有白鹿，人间自此无忠实。请让我轻轻说声：先生走好。

黄泥古韵的咏叹

汪启明

时隔五年，我再次来到位于长河北岸的黄泥古镇。

真正让我开始打量黄泥的，是读了著名作家徐迅的长篇文化散文《十二月花神》。自那时方知，黄泥古镇有三街六巷，建筑属于皖派风格，粉墙黛瓦，四水归堂，前街后坊。它是第五批中国传统古村落，亦是“千年古镇”——传说此地为唐朝时的安乐县旧址，因水陆交通便利，宋末元初便聚成了集镇，至明清达到鼎盛，得了“小上海”“二苏州”的美誉。商贸云集，舟楫往来，带来了文化的繁荣。“龙坦龙灯”始于明太祖朱元璋在龙坦村练兵时的遗风，而省级非遗《十二月花神》，自明万历年间便开始在街巷间流传。

此次再来，是陪同省作协评协领导、安庆师大教授等亲率的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团队走进黄泥街社区调研《十二月花神》。黄梅时节的天像浸了水的宣纸，雾蒙蒙，飘着雨，古街的瓦楞和青石板路湿漉漉的，两旁门户紧闭的屋舍和店铺的砖墙也是潮湿的，那原本洁白的粉壁经了岁月的烟熏雨渍，泛出温润的牙黄色，几处墙皮剥落处，露出底下青灰色的老砖，砖缝里竟探出几茎蕨草的嫩叶。整条街冷冷清清的，除了我们几个，再也看不到其他人影。

社区会场里却是另一番热闹景象。社区领导和三位非遗传承人早早等候着，桌上摆着纸角卷曲且有些发黄的材料。会上我才知安庆师大客人的来意：为全面传承《十二月花神》，他们已立项，要通过调研、体验与挖掘，借助现代声光电技术，将这一古老的歌舞立体地呈现出来。

整个上午，大家不仅梳理了它的历史、曲谱、内容、道具和演出形式，几位女大学生还换上花神服饰，手执云片道具，跟着传承人一招一式地学着。她们神情专注，眼波流转间，倒颇有几分“花神”的风采。

午间回镇政府，只有我与镇上负责文旅的小陈步行。这次他引我从挂有“中国传统古村落·黄泥村”标志牌的街口进去，但街巷里仍然是空空荡荡的，两旁大门紧锁的民居和插上门板的店铺，像一个个孤独的老者在静等着游子归来，顺着瓦当滴下来的雨水仿佛是他们的老泪。走到“丁”字街口，总算见着两家开着的店铺：一家裁缝铺，老式缝纫机喀嗒地响着，店主正低头缝制衣服；对面一家煎饭店，几个赤膊的汉子围坐着吃午饭，满头大汗。老街除了这点烟火气，再也没有什么了。

小陈边走边做点介绍，为了发展乡村旅游，政府曾投资两百多万元，依照“修旧、饰旧、保旧、如旧”的原则修复了老街，但游客依然寥寥。他又说起《十二月花神》的传承困境：三位省市县级非遗传承人，年长的已八十六岁，年轻的两位也过了花甲；青年人在外打工，只有过年才回来看看热闹，想请她们习舞，便跑得比兔子还快。我听着，心里沉沉的，雨还在下，淅淅沥沥的，像在替老街叹息。

午饭后，带队的两位教授还执意要带学生们走访曾担任《十二月花神》导演的胡炳贵老人。我们一行十余人，在空巷一角的平房里找到了他。

老人八十又二，但精神矍铄，耳聪目明，曾写过一篇《〈十二月花神〉轶事》的长文。他开口便说此地自古文化氛围浓厚，文艺演出团队一直存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演出的《天亮前》曾极大地鼓舞了解放军的士气。而《十二月花神》更是一段漫长的故事——先有舞曲，后有歌词，曲子可追溯至殷商时代的《枹枹台》，也有说成《枹枹台》，涉及武王伐纣的旧事。明万历年间流入此地，至清乾隆年间定型，由十五人演出（十二花神、观音与两名花童），却是哑巴舞，全凭身段与眼神传情。曲子因战乱一度失传，幸得琴师程树台抢救；一九五四年，艺人汪亚英开始依曲填词，再经邻村的民国时期毕业于安大的陈景平打磨，才有了今日的歌舞模样。老人说起当年层层选拔、进京演出、受中央领导人接见、登上《人民日报》的盛况，眉宇间仍洋溢着自豪之情。最后他补充道，此歌舞已于一九八九年收入《中国民间舞蹈·安徽卷》。我们起身告辞时，老人意犹未尽，说还要为《十二月花神》增添更翔实的史料。

走出那间平房，雨不知何时停了，薄薄的日光从云缝里漏下来，把湿漉漉的青石板照得发亮。我们被老人家的精神所感染，古镇虽冷静，却从未失掉赓续文脉的心跳；《十二月花神》传承人年事虽高，可对晚辈言传身教的那份热心却丝毫不减；看到这些年轻人对非遗的热爱与她们对传承路径的设计以及活化非遗的行动方案，我忽然觉得，那条空荡荡的老街上，其实已有一粒粒种子正悄悄发芽。就像这梅雨，看着是连绵的愁绪，可每一滴落下去，都在催着万物的生长。

